

音乐之爱与命运之思： 伟大的音乐中有哲学无法言说的悲怆

——访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王德峰

本报见习记者 陈瑜

罗兰·巴特在他的论文《作者之死》中曾提到，当一部作品完成，作者就不再是意义的来源，取代其权威地位的，是读者。而今天，王德峰也说，“古典乐是为人民写的、为外行写的”，“听音乐听到最后，你会发现所有作品都是为自己所写”。即便如此，当记者第一次听到他对音乐这样的判断，仍是有些惊讶的——就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，欣赏古典乐有着专业的知识壁垒。不过，经过长达 60 分钟的交谈，最初的疑惑随着他手边淡淡的烟雾飘散而去，且看他如何一步步“解构”古典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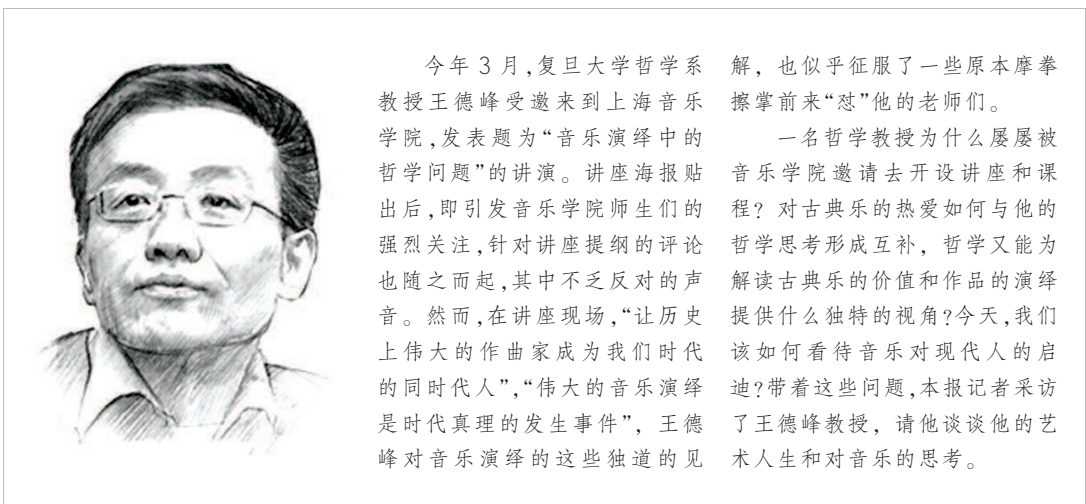
—

“我无法想象可以拿贝多芬的音乐当作闲聊时的陪衬和背景装饰。一个咖啡厅老板用贝多芬的音乐作背景，他当然可以这样做，但在咖啡厅里听到贝多芬，我会突然出神了，然后我眼前的咖啡也看不到了，我接着要奔回家，要去听伟大的音乐了。”在一次上海音乐学院的讲演中，面对听众，王德峰曾这样说。在他看来，音乐对于西方近代知识分子而言是对命运的表达，但我们今天对音乐的态度可能会错失音乐的本质。

熟悉他的人都知道，除了“复旦哲学王子”这个广为流传的美称之外，他还是一位不折不扣的“古典乐发烧友”——每当夜深人静时，打开唱片机，倒上一杯红酒，点上一支烟，跟着美妙的旋律思绪万千。听到动情之处，他的内心总会涌现出一股冲动，想唤醒所有沉睡的人。“世上有这么美好的东西，你们还睡着干嘛？”在复旦，只要听过他那火爆得“一席难求”的通识课《艺术哲学》，对这个“段子”就一定不会陌生。

与古典乐的不解之缘是如何结下的？采访中，王德峰不紧不慢地道来。

原来，他从少时接触到古典乐，虽然他的父母只是普通百姓，没有受过西方文化的熏染。不过，他当时的邻居是一位落魄的“资本家”，尽管从别墅搬到了小弄堂，但对孩子的教育没有变，每天都要求自己的孩子练习小提琴。王德峰的古典乐启蒙就得益于此：“小时候住在石库门的房子里，夏天窗户都开着，晚上我躺在自家的凉席上纳凉，听着隔壁传来的不那么熟练的演奏声，觉得很新奇。我当时对西方古典音乐没有明确的概念，它却还是打动了我——我那时年



纪虽小，对人生还是有些感怀的，这些感怀在这个旋律里被表达了。后来才知道，原来那些都是很有名的曲子。”

正式的古典乐之旅是从他读大学开始。改革开放后，西方古典音乐以磁带的形式传入中国，那时延安路茂名北路有一家音像店，是他常去的。除了买磁带外，他还在那买了本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的《音乐欣赏手册》，里面有对中外音乐作品简单的介绍，然后按图索骥，买来以后放在一个很简单的单喇叭录音机里播放——“既然都出现在《音乐欣赏手册》里了，那肯定是必须要听的。”

“后来，感谢现代科技，当我在街上走的时候，我可以把柏林爱乐乐团装在口袋里，而且我还能轮换着，有时请卡拉扬进来，有时请切利比达奇进来。尽管我平时总是批判科技，但在这一点上我很感激它，因为它让一个伟大的艺术殿堂向平民开放。”王德峰幽默地说。就这样，每天听音乐，这个习惯他保持了 30 多年，雷打不动，从未间断。

如今，他对古典音乐史了如指掌，对那些音乐家和他的作品如数家珍。当记者问起他喜欢的音乐家，他滔滔不绝地报出了一长串名单：柴可夫斯基、贝多芬、肖邦、维尼亚夫斯基、勃拉姆斯、拉赫玛尼诺

夫、普洛克菲耶夫、肖斯塔科维奇……甚至，还情不自禁地哼唱起了几段旋律，“听的音乐多了，脑中就如同积累唐诗宋词一般存了很多古典乐的旋律，和别人会忍不住哼些流行歌曲一样，我有时也会跟随心情哼上几段”。但是，有一个问题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：“幼时那些夏天的晚上，为什么古典乐会打动我，即便那时的我对它们一无所知？”

二

和其他音乐领域的专家和“发烧友”相比，王德峰对古典乐的理解和鉴赏方式是独树一帜的，“专家们会从音乐作曲的技巧、格式方面的突破和创新，来讨论一个作品的价值，或者把它纳入某种风格和流派中讨论，这些都是非常专业的，我也会关注，但这不是我喜欢音乐的方式。它不是行内的密约，不是行家们自己把玩的东西——我的一个基本认识是，音乐是为人民写的，为外行写的。”

“可是，在许多人看来，古典乐是有门槛的，但为什么您却说，音乐是为外行写的？”记者追问。

“人们通常认为西方古典乐有门槛，在某种意义上是有道理的，主要源于民族差异，音

解，似乎也征服了一些原本摩拳擦掌前来“怼”他的老师们。

一名哲学教授为什么屡屡被音乐学院邀请去开设讲座和课程？对古典乐的热爱如何与他的哲学思考形成互补，哲学又能为解读古典乐的价值和作品的演绎提供什么独特的视角？今天，我们该如何看待音乐对现代人的启迪？带着这些问题，本报记者采访了王德峰教授，请他谈谈他的艺术人生和对音乐的思考。

乐是有民族特征的——我们中国人听自己的民族音乐，不会觉得有门槛，中国民乐中的好多作品也都是家喻户晓的，但西方音乐我们觉得有门槛，是因为中国人对欧洲文化中情感的表现方式，以及欧洲当时这批作曲家和知识分子的精神境界，确实是有些陌生的。但是，所谓的‘门槛’不是指对音乐专业知识的了解不够，音乐总是以某种技巧或者某种形式来创作，这种技巧和形式我们不了解没关系，因为音乐毕竟是一种思想和情感世界的展现，一种深邃而哲思的展开。伟大的音乐会鼓舞我们、启发我们，会提升我们对生命的感悟和对时代的领会。”

思索了一会，他接着说道：“音乐是用心灵去听的，不是用头脑去听的。走近西方古典音乐的一大障碍在于，许多音乐是无标题的，尤其是很多交响乐。我们听音乐经常有一种不知不觉的习惯，想要知道音乐里边的故事，这会妨碍我们走近它。有标题的音乐会给我们提示，比如说《罗密欧与朱丽叶幻想序曲》，你一开始就知道，这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爱情故事。但更多的音乐是观念无法言说的，所以无法为这些作品定一个标题。我们不要用自己的头脑去听，你尝试着想要理解的努力，一开始就阻止了

你进入这部作品。黑格尔说‘音乐是心情的艺术’，你要用心灵去听，听它如何自然地引起你心情的变化，这在我看来是对所有人都没有门槛的。”

但他也承认，爱好古典乐是需要学习的，需要作出极大的努力——当然不是音乐专业知识方面的理性学习，而是通过文学、哲学方面的积累来唤醒自己的想象力。王德峰一直保持着对文学的爱好。“1975 年中学毕业，我分配进了工厂做电焊工。工人空闲时谈饮食男女，我就看书，有时给她们背背贺敬之、郭小川的诗歌，他们都很喜欢我这个文弱书生。”舒婷的《这也是一切》《思念》《致橡树》，至今他仍倒背如流。他说：“诗歌的朗诵为什么需要背景音乐，因为如果音乐选对了，你会发现它能把诗歌的某种无法言说的境界展示出来。”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他更是热情倾注，尤其是对《红楼梦》颇有研究：“曹雪芹借贾宝玉之口说过这样的话，‘诗词一道，但能传情，不能入骨’，可音乐既能传情又能入骨。”

在他看来，音乐不是孤立的，它与文学、哲学甚至绘画艺术都是相互影响的。一个时代的音乐作品，跟这个时代的文学史和哲学思想都有关联——“当托尔斯泰聆听柴可夫斯基最著名的《如歌的行板》，感动得潸然泪下，他激动地说‘这是整个俄罗斯民族在哭泣’！那个时代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们陷入一种普遍的苦闷，他们迫切地想鼓舞自己，寻求出路，托尔斯泰是，柴可夫斯基也是。你听柴可夫斯基的交响曲，最重要的是最后三部，它们各自独立，又连成一个系列，反映了他对时代的探索：第四交响曲和第五交响曲分别是对命运的领会和抗争，第六交响曲则是最终的绝望，他找不到出路，所以